

再吃焖子



刘岩

忙了一天,走出办公室,天又是黑黑的,风刮得更猛了,路灯星星点点,在树叶之间晃来晃去,显得路上光线更暗,车辆行人都急匆匆的,落叶在车轮间翻飞,把回家的脚步催得更急了。

从三站走到青年路,好想找个热乎乎的地方吃小吃,看了几个小店,都没有想象中的样子,失望之余,最后还是决定去看看卖焖子的那个小摊。

这里常来,摊主是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,单位效益不好,下岗了,有点木工手艺,平时靠朋友介绍点活干,没活的时候,就摆摆小摊卖焖子。他的焖子不是最好吃的,但味道还好。

看我,他好像挺抱歉,“天真冷啊,你在这儿吃,还是带走?”似乎天冷是他的错。“就在这儿吃吧!”走了半天已经觉得冷了。他把唯一的小桌子拉近到炉子旁边,“在这里坐吧,亮堂还暖和!”这时才发现吃焖子的就我一个人,但还是接过他递来的小凳子,坐了下来。

平底锅里滋滋地冒着香味,灰白的焖子底上不少已经开始结了焦黄的壳,他熟练地给我盛已经煎好的焖子,填上各种着料,递过来。最早吃焖子是20年前在建昌街,那时候是两毛钱一盘,说是盘子,其实就像现在餐厅里吃饭的接碟,用自己做的小铁叉子挑着吃,那是最好吃的时候。后来,建昌街的焖子摊被赶跑了,就去南洪街吃,味道差了点,但还凑合,有时候上班都偷偷跑出来解馋。再到后来,连这里也没有了,有好长时间找不到吃焖子的地方,偶尔吃上个把次,味道感觉不对,直到找到这一家,味道总算有一点儿地道了,就常来,跟摊主也熟悉了,吃的时候,常跟他聊聊,听听他的故事。

这次他说的是怎么做焖子。他说这种小买卖,如果出去进焖子,就不赚钱了,就自己用地瓜粉做,一斤地瓜淀粉大约能出四斤焖子。他还说,现在天冷了,买卖不好干,最好是春天,其余的时候,不是冷就是热,都不好卖,能差一半呢,不过,现在下班早了,六点就可以收摊了……

听着他絮絮叨叨地说着,想象着他一天忙碌的样子,猜测着他每天清点收成的模样,似乎能体会到别样的生活,别样的人生。这种简单劳碌的生活给了他豁达、顽强的性格,就像路边落尽叶子的行道树,默默地数尽了风风雨雨,却依然坚强地挺立成一道风景。

娶了媳妇忘了娘

矫寿功

在烟台农村,凡是儿子婚后不孝敬父母的,人们就会用这样一句俗语来形容“山鸩雀(喜鹊)尾巴长,娶了媳妇忘了娘”。

单从喜鹊娶了媳妇忘了娘本意讲,就是说小喜鹊出窝后,就组成了新家庭,从此便不闻不顾爹娘了。难道其它鸟类出窝后就顾及爹娘了吗?事实并非如此,既然鸟类都是不孝之子,祖先为啥要拿喜鹊作比喻呢?不明事由,单纯为押韵而言,尾巴长的鸟儿多着呢,比如山野鸡、孔雀、凤凰等,尾巴都比喜鹊长,为啥不拿她们作比喻呢?不得其解。



如果回到我们人类,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情况,就有了一定的说词。有人不仅要问,为啥男人婚前对父母百依百顺,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呢?细分析是有一定原因的,而这个原因的产生就是媳妇起的“化学反应”。

人说大树不是草长的,媳妇不是婆养的。因为血缘上的关系,媳妇与婆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。儿子想孝,媳妇阻拦,轻者拌拌嘴,重者拳脚相加,纠葛几个回合之后,儿子便怯下阵来,一是怕伤了夫妻感情;二是怕邻里笑话。只好放弃父母这一边,长期下去就形成了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局面。

做父母的虽然心里不高兴,却无法改变现状。有的父母怨儿子不争气,娶了媳妇当不了家,骂儿子是窝囊废,也有的父母同情儿子的处境,理解儿子的难处,并不责怪儿子的无能,而是顺水行舟,顺其自然。

生活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况,未婚青年笑话已婚青年是草包,怕老婆。可轮到自己结婚后仍摆脱不了“忘了娘”的困境。所以就有了如此的说法,“未结婚的八个嘴,结了婚的夹着嘴”。试想,谁都不想落个不孝之子的名声,如果每个男人都能治服妻子,像婚前那样随心所欲的孝敬父母,那山鸩雀尾巴长,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俗语也就失灵了。当然,好媳妇也不少,不是全篇一律的都不孝顺老人,只是一块臭肉带坏了满锅而言。

两次下乡 深受教育

吕富苓

1963年,中央指示,文科大学生要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11月烟台师专中文科的师生到栖霞县参加“小四清”运动。我们组住在一个小村里,矮矮的窄窄的草房,墙是用石头蛋垛起来的,街道坎坷不平,村东头有个地窖,男的那儿编席,女的刮高粱秸。

我们的房东苦大仇深,旧社会要过饭,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情特别深。解放后,儿子当上了村干部,女儿和我们年龄差不多,不识字。我们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,就睡在女儿的炕上,因为是冬天,没大劳动。



白天大娘就给我们讲旧社会的苦难经历。大雪天,她领着孩子跳雪窟窿去要饭,整天忍饥挨饿,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人翻了身。大娘哭,她女儿哭,我们也哭。大娘亲切地握着我的手,问我们是哪里的?你那儿也住房子吗?也吃麦子和苞米吗?也睡炕吗?当我说我们黄县老家比较好时,大娘信任地说:“等俺闺女上你那儿去吧?”大娘那么醇厚善良,那么勤劳节俭。我们恨透了地主恶霸,是共产党让这么好的人们过上了好日子。

我们写革命史、家史。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,武工队、八路军在这儿长期战斗过。有一次,乡武装队长给我们讲战斗故事:一位武工队员被国民党包围在一所房子里,敌人端着枪,高喊抓活的,武工队员应付着,拖延着时间,估摸敌人麻痹了,他突然两手把门向内一拉,敌人一惊一闪,他嗖一声一个箭步蹿了出去,逃走了。我们虚惊一场,真佩服武工队员的机智和勇敢。

1965年9月到1966年4月,我们随山东省委社教工作队赴海阳参加社教8个月。我们住的村,全是盐碱地。一是光棍多,二是哮喘病多,街上深沉的吼声不断。我们跟着记材料,写村史写家史。我们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那地方,春天种麦子,一尺见方的地儿种一蹲麦子,麦子只长一尺多高,麦穗一寸左右。队里会计暗地里对我说:工作队能让我们吃上黄饼子就好了。这里的人常年以猛子虾酱和从南海滩上刮的盐花当就头;还不到春节,没粮没地瓜了,吃芋头叶子少加点玉米面做的菜团子,那点玉米面是工作队员领的口粮。工作队的老同志整天捂着肚子,后来,工作队另起了锅灶。

这两次下乡使我们深受教育,认识了旧社会,认识了更贫穷的农村和农民。当时师范生吃饭是不花钱的,有少数困难的同学还享受助学金,看看农民,得多少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啊!我们深感责任之重大,更加努力地学习了。

银幕下的记忆

李文毅

一道银幕,是一页时代的风帆;一场电影,是一次文化大餐。20世纪50-60年代,渔家看电影留下的许许多多趣话,至今回嚼,原汁原味不减。

长岛上只要来了电影,军民皆大欢喜。尤其是战斗片、反特片,更是吊人胃口。影讯,往往被小学生先捕捉到。一旦获悉,一人传一班,一班传一校,一校传全岛。“来电影了!”比平时高八度的宣叫声,四边生嘴,八面长腿,消息被多方位地、重复地传播着。

电影的场次,往往是小岛演一场,大岛演几场。无论是几个点接力演,或是重复放,影迷们宁肯赶个尾,不可漏了场。谁能多看一遍,是沾了大便宜。偶尔放映机或是发电机出了故障,人们等待的耐力,远远超过等车赶船。人们把期待的目光都聚焦到放映员身上,相信妙手出奇迹,银幕似帆顺。即使中途风雨来了,只要电影不停,观众绝对不散。有时,人太多,连队拉到幕后看“反影”,有时在侧后方听电影,把好场留给群众。



看电影并非年轻人的专利。岛上有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,趟上了好几趟,他们用小车推,用箩筐抬,硬上把老人搬到电影场,让一世未出过岛,没见过电影的老人,看看外面世界。这种美德,往往得到全岛上人的好评。

银幕是一页历史的白纸,记有多趣事。一年,砣矶岛井口村一位老人,看到电影里打雷下雨,误把自己当成剧中人。她大声小气地喊媳妇,“小桂兰呐,快往家走,院子晒的鱼米呀!”他边喊边起身,引得全场大笑。

大黑山岛西濠村的百岁老人葛彩玲,得知北庄团部演电影。她半下晌就架鸟先行,迈了三寸金莲,走了5里山路,先到娘家歇歇脚,就忙到电影场占地地方。那天晚上演的彩色戏曲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那时,葛彩玲40多岁,因早年丧夫守寡,蒙受婚姻的不幸。可能是触景生情,勾到了往事,她百般地同情梁祝之恋,万般地体恤蝴蝶之梦。她看着电影无声哭,回家路上失声哭,遇到知己诉说哭。而今,她已102岁了,人们还在述说她哭梁祝的趣事。

有时,赶上正月初二放电影。按习俗,此日晚上送神。为了不耽误看电影,有的提前送了,有的推后送,还有的回家快送快回。有个渔民跑到场外,朝着老家喊:老太太,请回吧,明年再来呀!

难忘的黑白电影,它营养了一代人。

二次发酵 健康伴侣

吉斯果园

给健康加上“小金罐”

创发酵型果醋饮品领导品牌

JISI 吉斯集团 健康产业兴 吉斯中国梦

地址:烟台市牟平区师范路426号 业务电话:4237199